

规范、认同和中美安全合作前景

刘永涛

【内容提要】 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利益及行为,不仅受制于冷战后世界政治体系的物质结构,还受制于这一体系的社会结构。本文认为,建构和发展一个健康和良好的中美安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国积极遵守与国际安全相关的公正规范和准则。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背景下,两国的安全利益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外来威胁,从而使它们的国家安全命运开始被更多地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 规范 认同 中美安全合作

作者简介】 刘永涛,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博士。(上海 邮编:200433)

1997年和1998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先后分别对方国家进行了国事访问,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1997年两国峰会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要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确实,作为冷战后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大国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将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未来世界政治的命运。一个对抗和敌意的中美关系将给世界带来不幸和磨难,一个健康而良好的中美关系将对国际和平与稳定带来积极作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如何避免出现前一种情形,建构和发展后一种关系,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探讨的重要问题。

冷战后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处于复杂且不确定的过程中。国家安全再度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构成两国广泛的双边关系中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次关系领域。^① 本文以为,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相互谅解和合作,将为21世纪中美两国、亚太地区及全球范围内的稳定和繁荣带来希望。关于冷战后中美安全关系的论述较多,本文仅试图从社会学或建构主义视角,探讨规范、认同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中美安全关系的重要影响。正如美国学者大卫·坎贝尔所说,“不确定的时代要求有不落陈套的分析”。^② 本文认为,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处于冷战后国际安全环境变化中的中美安全关系发展的脉搏,人们需要有更为开拓的视野去认

识和研究中美安全关系,因为现存的安全分析取向不能充分说明和解释当前中美关系的状况和趋势。本文想指出,事实上,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安全利益及行为,不仅受制于冷战后国际体系的物质结构,譬如国家实力分配、均势等,还受制于这一体系的社会结构,譬如受到规范和国家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后者是现存占主流的研究取向所低估或忽视的方面。

本文首先扼要叙述现存占主导地位的、主要从体系的物质及自我角度认识中美安全关系的研究取向,指出其不足之处;其次,提出如何从社会学或“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解释中美安全关系的现状;然后,从对规范和认同方面的分析入手,展望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前景。

一、现存占主流的分析视角

在过去近20年里,以国际体系行为体的物质实力分配、地缘政治及结盟关系为视角重点的研究取向——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称为新现实主义学派——一直主导着学术界对中美安全关系的理解和思考。这一研究取向把国际政治领域看作是一个极端

^① 本文所使用的“安全”词语是一个与国家主权稳定相关的广义概念,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等。

^② 大卫·坎贝尔:《书写安全:美国对外政策和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

残酷的场所,认为国际政治的特征是国际体系始终处于无政府状态,由于在国家行为体之上没有更高的政治文化或权威,因此,国家的基本渴望是谋求自我生存。为了实现和维持自身的安全,国家的一切行为从自我利益考虑出发,不断谋求权力、财富和威望。自助原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最基本原则。这种受自我利益驱使的国家行为造成所谓“安全困境”,即一国的实力增强对别国安全构成潜在威胁,引起别国相应地谋求增强自身的实力。一种“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寻求国家间实力平衡或物质实力的合理分配。在中美安全关系方面,根据这一研究取向,当中国的政治及经济力量在国际舞台呈上升趋势时,它使国际关系的结构现状发生变化,这种权力的过渡对国际安全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在美国知识界和对外关系决策界出现了“未来中美关系对抗”的担忧,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兴起对美国在亚太及世界的安全利益“构成威胁”,因此,需要对其进行“遏制”。在中国,也存在着采取这种以关注物质实力变化和自我考虑为主要视角来看待中美安全关系的研究取向。

这一研究取向所存在的主要缺陷是以相对静态和单一的物质及自我观点看待错综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把国家的安全利益和行为视为理所当然的不变量,低估甚至忽视国际体系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国家安全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现存占主流的分析取向中,另有一种尽管处于次要地位、但日益具有影响的研究视角——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认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国际机构、机制以及行为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起着积极作用。譬如倡导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进行相互交流、建立相互信任机制等,便是以这种研究取向为指导的产物。该研究取向的视野有所开拓,注重国际社会规范、机构和机制等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它同样以相对静态的眼光认为国家的安全利益是存在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背景之外的东西。

二、建构主义分析视角

一种可选择的研究取向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待世界政治。由于这一研究取向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种建构,因此,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它又被称为建构主义理论。这一分析取向认为,国际体系存在着两种结

构: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国际体系的物质方面是指“某一社会里诸亚群体的相对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物质实力分配”,而体系的社会结构则指“行为体行为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作为一个社会特征的主流信仰和认识”。^①世界政治(包括本文所讨论的中美安全关系)既受制于国际体系的物质条件,也受制于这一体系的社会结构。该取向更偏重于从体系的社会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把被主流取向所低估或忽视的规范和认同等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因素重新引入国际政治的研究里。这一取向的基本理论命题是,强调把规范而不是物质放在首位,重视规范或观念的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规范和认同可以影响和规定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的构成。

规范是一种社会规定,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和习俗等。社会规范影响并规定着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具体利益、行为、优先考虑以及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工具。认同则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里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认同规定着它自身的利益及行为的形成。所谓集体认同是指某行为体自身与其他者建立认同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或协调行动。

以中美安全研究为例,根据这一取向,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是一种社会建构,国际国内社会规范、法律、习俗、习惯等可以从根本上规定或改变两国安全的行为和利益。两国之间具有各自不同的认同,它们是造成两国之间发生冲突和危机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需要谋求在两国之间形成一种集体认同,使一方在谋求实现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是一种完全的自我行为,而是有必要考虑到确保对方安全利益。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是与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实现相关联的,或者说,一方的国家安全是另一方国家安全的一种延伸。如果中美之间形成一定程度的集体认同,那么,它便能为两国的安全谅解与合作确定基础。相反,如果美国把中国想像成美国的敌人,那么,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美国的敌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和危险可以通过

^① 彼得·卡森斯坦编:《国家安全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和认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9页。

想像变成现实。

三、规范、认同与中美安全合作

规范和认同不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个新术语,而是长期被占主流理论取向所忽视的两个分析因素。然而,中美两国的安全利益和行为,除了受冷战后国际体系物质结构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中美两国的安全合作前景可以从这些因素中得到解释。

中国安全文化与国际规范

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并推动和影响国际体系结构在物质力量分配方面的转型以及冷战后国际新格局的形成。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一个不断强大的中国将是国际安全方面的一支重要稳定力量。理由是,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较为系统的安全文化观,它们以伦理规范为基础。当代中国的治国思想也体现了“法制”原则。它们作为中国国内规范来源的重要部分,如果被赋予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的含义,表现为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积极倡导和参与国际规范和机制,致力于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追求规范和伦理在治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人文精神方面包含以非武力治国安邦的安全文化观。这些思想延伸至国际关系方面,表现为强调以道德规范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且以孔孟之道和老庄之学为例。孔孟之道的哲学核心是“仁”,“仁”是一种生活准则,以后被孟子发展为政治准则。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用孔子的话讲,所谓“仁”是指“爱人”。孔子关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对“仁”所定之界说,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可理解为“仁”的本质。因此,我们看到,孔子提出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主张人与人之间建立互相尊重、信任和同情的伦理关系,最终以“仁”达到安邦治国目的。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仁”所表达的思想可被理解为强调以道德伦理处理国家之间关系,强调国家之间互相平等和尊重,从而确保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和平。

老庄之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另一主要流派,也称道教。“道”本是道路的道,后经引申而具有规律、规范的意味。在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道”不仅是最高的实体范畴,用以说明世界万物产生的根源及其运动变

化的规律问题,而且是人类社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是事物的本源、本质和规律的总称。遵循“道”乃遵循规则和规范。老庄哲学的精髓在于指出了事物的辩证法,譬如道家的贵柔学说。老子说:“弱者道之用”,认为柔弱是“道”的作用,以此强调柔弱胜刚强,提出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少胜多的道理,“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道教思想反映在国际关系方面,表现为使用道德力量而不是武力。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就是力量。自身潜力的充实不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实现,而是与他人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与他人合作、遵守互补原则。

从根本上讲,中国是一个“讲究规矩、讲究秩序”的国家。但是,近代中国又是一个不断遭受外国入侵和殖民瓜分的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而结束了这段痛苦历史。当代中国在社会政治及经济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第三代领导集团重新强调和追求以依法治国、以法安邦。它显然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今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在国际关系方面,体现为积极参与国际规范,为国际社会的稳定作出努力。

在整个世界格局里,中国的综合实力在近十几年里获得相对提高。在美国,占主流的研究取向对这一情形抱极为审慎的态度,把中国力量的上升视为是对国际及亚洲安全的一种挑战或潜在威胁。这一取向认为,国际体系权力的转换可能导致上升力量打破国际现状包括国际规范。历史上如二战及冷战的爆发提供了这样的例子。然而,当代中国在力量增强的同时,并没有谋求打破现有国际规范,相反,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积极而稳妥地逐步参与国际安全机制并遵守其规范。仅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为例。自1992年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重要步骤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国际规范;同年,中国承诺遵守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参加核不扩散条约;1993年签署化学武器公约;1994年就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和裂变材料生产作出声明;1995年发表关于军控及裁军内容的白皮书;1996年就核转让问题发表声明,同年宣布中止核试验,签署全面禁试条约等。^① 本文认为,除了国际国内政治安全环境的作用外,上述中国古今安全

^① 谢利·坎:“中国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当前的诸政策问题”,《美国国会研究处事务简报》,1997年8月,第1页。

文化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指导着中国这类行为。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中,中美双方都愿意推动健全并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和规范。如果中美两国共同支持并遵守有关国际规范,那么,这将有可能使两国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突和危机加以控制和管理。首先,中美的安全利益受到它们所遵守的国际规范的规定,而不是随心所欲的结果,为了遵守规范和给国际社会留下良好形象甚至会以牺牲短期的利益为代价,譬如,中国对当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抱的坚定立场,采取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政策,对一些遇到困难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从而为稳定这一地区的金融及经济安全作出了贡献。其次,在国际规范的制约下,中美两国会注重自身安全行为的合法性,使其易于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第三,如果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发生分歧和摩擦,它们可以在国际规范的框架内通过谈判或其他外交形式予以解决。

集体认同与安全合作

在讨论中美安全关系方面,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是“安全利益”。现存占主流的视角认为,在这样一种缺乏国际主权的体系结构里,中美两国一般从自我目的出发来谋求自身的国家安全利益,并且谋求增强各自国家综合实力,反过来,这种实力的分配及对比变化是影响两国安全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然而,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除了反映在物质实力层面上之外,还体现在双方在国际安全体系背景中的相互社会互动方面。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它们之间在历史经历、文化背景、政治信仰及价值取向方面均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它们在国际政治中所充当的角色、所处位置及国家发展水平也有差别,这些会影响它们之间在主观上如何认识和理解对方。中美两国彼此之间的主观认识和理解可能是敌意性的,也可能是友善性的,而且,其认识的结果给国家的综合实力赋予实际含义。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抱有敌意色彩,那么,它可能成为造成两国之间冲突的一个来源,而且,中国的综合国力增强会被理解为中国对美国的安全利益的威胁增强。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是友善的,那么,它可能在中美之间造成合作的关系,中国物质实力的增强也不会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

这种认识和理解的过程是国家认同之间社会互动的过程。集体认同程度越高,中美之间谋求安全合

作和共同行动的程度也越高。因此,在安全关系方面,如果中美两国能够扩大集体认同部分,那么,它将为两国在双边、地区及国际范围的安全合作打下基础。本文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认同差异,因此决定着两国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现象,但是,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日益受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两国将形成较为广泛的集体认同,在此基础上构成安全合作和共同行动。一般地说,中美之间的集体认同的形成过程,表现为双方从彼此的消极对待转为积极对待,从认为对方是自我安全利益实现的障碍转向认为对方是自我安全利益实现的一种延伸。下面本文从三个方面来看当前及未来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形成集体认同的可能性。

第一,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国家之间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中美两国不断被卷入与双边、地区及国际安全相关的事务中。因此,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的交往和接触频繁。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双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负有重大责任,共同遵守与国际安全相关的国际规范。中美所承担的责任、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处的地位,使它们的安全利益不断得到调整。这样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框架为中美之间形成一种集体认同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性。

第二,当今中美的安全命运共同面临着外来“其他者”的威胁,主要有核扩散等一系列事关国际社会普遍安全的问题,如国际犯罪、毒品走私、非法移民以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环境污染等。这类跨国威胁不是中国或美国的自身能力所能独立对付的,这就为中美两国合作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从发展的趋势看,这类威胁会不断加剧,会把中美的安全命运更密切地联结在一起,从而进一步促使两国在安全领域形成集体认同,即中美双方确定共同的威胁来源、具有共同的安全目标和期待、在减轻和防止这类威胁方面采取共同的行动等。两国所共同面临危险的程度与它们之间的集体认同程度构成正比。在集体认同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将会得到加强。

第三,在当今科学、通讯及传媒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国家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增多,国家间安全机构运作和安全政治观念也不断相互影响和交流。例如,中美同意“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建立元首间通讯联络,以便直接联系”,中国借鉴西方(下转 45 页)

测和评估,当前战略的实际效果更取决于军备的质量和反应的速度,而更少取决于保密。当然,这里所说的开放不是彻底的开放,也不是无条件的开放,更不是台湾、西藏等主权问题上的退让。

安全问题上的开放另外一层含义是建立中国的亚太和全球的安全网络,以促进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影响力。这一网络应当包括 internet 论坛、各种国际会议、NGO_s(即非政府组织)以及人员交流。网络的目的是促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安全政策的了解,同时帮助中国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了解国外的最新动态。中国面向国际的声音应当是多元的,不要害怕中国方面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应当把不同声音的并存看成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进行中国安全网络建设时,有两种意识值得重视:一是网络意识,各种机构(网络单元)之间的沟通、协作就是网络,在沟通中会碰撞出各种思想和合作的机会。网络本身就是效率,因此要打破系统、部门的彼此封闭,加强沟通。二是公共关系意识,要掌握并运用公共关系的客观规律,网络意识

也是一种公共关系意识。

四、新安全观对于安全政策和战略的影响

总结新安全观的一些基本点,就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行不悖,安全观应随着国际现实的发展不断放大;在更大的范围内考察安全问题,尤其是要看到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对安全问题的影响;开放、参与就是力量,它们能够增进安全,利用现有网络关系和创建新的网络维护和促进安全。

多边安全是当前国际发展的重要趋势,利用得好可以做到得大于失;在传统安全问题较敏感的情况下,可以让非传统安全先行,设立论坛,讨论机制和规则,以培养互信和合作的精神;参与讨论和实际参加机制是两回事,但积极地参与讨论可以保持开放和开明的国家形象,可以为实际参加机制做准备,符合利益时可以参加或倡导机制的建立。

[责任编辑 邵峰]

(上接 36 页)

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安全机构的组织文化,对自身的安全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所有这些也为中美在安全领域形成集体认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

因此,在国际体系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它们的国家安全难以仅从“自我”考虑为出发点得以实现。双方需要分享这样一种共识:把双方的安全利益的实现看作是自身安全利益实现的延伸。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多变的国际环境里,这种共同利益规定中国对美国不搞对抗。尽管中国可以在国际场合对美国说“不”字,但是,中国不希望这样,也不想对美国做“不”先生。中美两国应该在安全领域从绝对的“自助原则”转向相对的“他助原则”,以便使各自在安全合作过程中通过某种意义上的他助而实现自助所想获得的安全利益和目的。

四、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规范和认同对中美安全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它们各自的哲学传统和安全文化中均包含有谋求建立和遵守国际规范和伦理,以此作为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最终确保国际和平与稳定的思想。建构和发展一个健康和良好的中美安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两国

积极遵守与国际安全相关的公正规范和准则。在此基础上,两国的安全利益和行为得以合法化和正当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两国在安全领域里的分歧和摩擦。即使在安全问题上出现冲突和分歧,两国可以在共同确认和遵守的国际规范框架里,通过谈判及有关合理途径加以解决和控制,从而为中美在安全领域取得谅解和合作打下基础。

本文认为,由于中美各自具有不同的民族特征、不同的历史文化经历,并在当今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角色和身份不同,它们各自的国家安全利益也是很不相同的。然而,在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里,中美之间的安全关系不断受到体系结构中社会文化互动的的作用,而且,两国的安全利益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威胁,从而使它们的安全命运更加密切地被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为两国形成更为密切的集体认同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也为两国在当今及未来安全领域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打下牢固的基础。

中美之间在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规范和集体认同不可能完全消除两国间的分歧和冲突,但是可以减少和控制它们。

[责任编辑 邵峰]